



梁亚滨

全球气候融资困境如何破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于11月1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气候融资，特别是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应对资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和此次会议核心议题之一。

当前，全球气候融资缺口巨大，阻碍气候适应的规划和实施。据相关机构估计，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将每年需要近2.4万亿美元才能实现气候目标，而目前的投资额仅为其1/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2030年气候适应资金缺口或将达到3590亿美元。从全球范围看，气候融资主要来源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其中，政府公共资金是最核心的来源，以发达国家为主。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态势仍在延续，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越发受到国内预算约束，援助承诺不断违约。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虽然重视气候投融资，但受到投资风险、回报周期和收益率制约，难以满足长期持续的融资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资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配情况明显不均衡，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少数中等收入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等地区获得的资金严重不足。气候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诸如项目审批流程烦琐、资金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甚至不乏资金浪费和挪用现象。2024年9月，欧盟审计院对欧盟一项最重要的援助计划——欧盟重建基金进行严厉批评，因为缺乏控制和效率不高，分配给气候保护措施的资金被严重浪费。例如其中一个被称“与气候相关的贡献”为40%的供水改善项目实际的“气候贡献为零”。

发达国家理应为气候融资困境承担主要责任。首先，在导致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更大责任的国家，应在解决气候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讨论责任，不能简单比较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而是要比较历史累计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早在1997年，巴西政府就提出累计排放概念，强调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所造成。根据美国碳简报（Carbon Brief）的研究，1850年至2021年间，全球累计碳排放前10名中，西方5个发达国家加上俄罗斯的碳排放占比高达39%，其中美国作为最大的累计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的20.3%。但是，这些国家的全球人口比重只有10%。相比之下，中国、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累计碳排放量占比只有23%，但人口比重却高达42%。在历史人均累计碳排放量前10名中，加拿大和美国高居前两名，且只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个发展中国家。《公约》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为碳减排努力，但是发达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排放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其次，发达国家的承诺违约使气候融资困境进一步加剧。2009年，发达国家同意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以帮助其适应气候变化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直到13年后的2022年，发达国家才首次实现了这一目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计1159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历史欠账越积越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推进。再次，发达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主要形式为贷款而非无偿援助，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债务负担。联合国数据显示，从2019至2020年，超过60%的气候融资（约合3840亿美元）属于贷款，只有470亿美元是低成本或优惠利率资金，无成本赠款仅为360亿美元，而最不发达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借款利率却高达8%，远超过发达国家的一般利率。最后，发达国家贷款往往附带不合理的政治或经济附加条件，如要求经济结构调整、开放市场、接受西方标准等，不但侵犯发展中国家主权，而且破坏气候融资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原则，客观上阻碍其可持续发展。有限的资金往往无法按照实际需求合理流向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最急需支持的领域，如适应气候变化项目、贫困地区清洁能源推广等，反而成为个别国家以资金为筹码干涉他国内政或推动特定产业利益的工具。

气候融资困境已经对全球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对于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适应气候变化尤其重要，建造抗风暴房屋、种植耐旱作物、安装可靠的供水系统以及投资社会保障机制是许多适应措施中的基本要素。目前，全球有约一半人口居住在气候“危险地区”，死于气候灾害的可能性比其他地区高出15倍。因为发展中国家融资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在接受气候贷款后又会立刻面临债务偿还压力，极易引发财政危机、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2022年，斯里兰卡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发展所谓“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而导致整个国家破产的案例。此外，发达国家甚至以气候变化为由设置贸易壁垒。2023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完成立法并实施，在两年多过渡期后将于2026年1月1日起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一方面会压缩发展中国家能源密集型和高排放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格局失衡和全球产业链重塑，客观上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最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技术转让、投资合作等方面，往往利用自身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公正的发展利益。人类在所有经济领域都拥有实现净零排放的技术，而阻碍前进的，只能是糟糕的政策和全球合作的缺乏。可喜的是，中国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在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破解和应对气候融资挑战。一是从国际层面构建有效监督与协作机制，促进国际合作填补资金缺口。一方面，倡导并鼓励联合国相关机构或国际多边组织发挥牵头作用，建立专门针对发达国家气候融资承诺履行情况的监督机制，包括定期审查、数据收集与核实、评估报告发布等。另一方面，倡导国际金融机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建立全球气候融资合作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创新融资方式，如绿色债券发行、公私合营模式（PPP）等，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参与气候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形成统一的谈判立场和行动方案。既要积极主张自身合理权益，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提高气候资金的数量、质量和可获取性，确保气候融资公平、公正、透明，也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三是推动更加公正的贸易规则，坚决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应积极集体发声，联合抵制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推动建立基于公正原则、考虑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差异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合法权益，避免因气候融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遭受进一步损失。

“万物各得其所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面对气候融资的挑战，国际社会需强化合作。唯有全球共同努力，方能破解气候融资困境，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郭永真

古典学让不同文明在互鉴中进步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强调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古典文明成就斐然，古典学连接古今、贯通中西，能让不同文明在互鉴中进步，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提供启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古典学的起源与智慧传承

“古典学”一词源于拉丁文意为等级、划分（classis），现代英文语境下表述为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专指古希腊罗马经典文本研究。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包含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领域。在中国，古典学围绕典籍展开，如《诗经》《尚书》《周易》等。尽管其概念范围存在争议，但研究方向明确，即深入解读经典文献以挖掘人类文明的智慧和价值。

中西方古典学犹如同源之水，皆深深扎根于古代先贤的实践智慧这一丰饶土壤。在中国先秦时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展现经典知识对于个人成长和自我表达的關鍵作用。在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主张，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体现了西方古典学在起源阶段对个人发展的关注。这表明，古典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承载着育人使命，指引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

不仅如此，中西方古典学在价值观念上还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在道德准则方面，孔子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与柏拉图提出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遥相呼应；在社会理想上，中国的“大同”，讲究秩序和谐，西方在构建理想城邦等理论中也强调社会秩序稳定和公民各司其职。

此外，从经典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层面剖析，中西方古典学均对现代人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在《诗经》中，“夙夜在公”体现的一心为民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治理中公职人员的价值导向有着深刻意义，与为人民服

务等理念相通。亚里士多德所著《政治学》中关于正义与城邦秩序构建的内容，为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思考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中西方先贤伟大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照亮了人类发展的道路，使得人类社会更加公平、和谐与繁荣。研究古典学可以让我们在岁月流转中持续聆听前辈先哲们的谆谆教诲，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方向。

古典学在文明互鉴中的实践与价值体现

知识融合实践，助力构建跨文化理解的知识体系。首先，在知识体系构建层面，古典学是融合剂。西方文明源于两希文化，即希腊文化的哲学、科学等思想，希伯来文化的宗教伦理，是西方知识体系根基。东方有中国先秦经典、儒家仁爱礼义、道家无为自然等思想，还有印度吠陀文化，其宗教哲学等内容丰富。古典学研究整合东西方文化源头，可促进跨文化理解知识体系完善。其次，在思想价值维度，古典学挖掘共性之差异。如西方古典学中的“逻各斯”（Logos）所蕴含的宇宙理性与秩序思想，和东方道家“道法自然”中对自然规律的尊崇有深度契合。这种挖掘让文明在碰撞中相互尊重、学习，推动深度融合。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古典学带来创新。各国学者不仅相互借鉴方法，还共同构建新理论框架。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不同文明古典文献中的语言模式，挖掘背后隐藏的文化关联，为古典学研究注入新活力，加速不同文明融合进程。

遗产保护实践，为人类文明传承提供价值依托和具体保护措施。以敦煌莫高窟保护工程

为例，中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专项用于修复历经岁月侵蚀而受损的壁画、加固洞窟结构。古典学的研究成果为修复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包括对壁画艺术风格的理解、洞窟文化背景的解析等，确保了这一承载着中西方文化交流记忆的艺术宝库能够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在中东地区，伊拉克的巴比伦古城遗址虽然面临战乱等多重挑战，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下，多国派遣专家团队，利用先进技术和专业学科理念，精心守护这一人类珍贵遗产。古典学知识帮助专家们深入解读古城的历史背景及其所蕴含的古代文明信息，为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提供宝贵的学术支持。

全球治理实践，拓展全球文明互鉴的深度与广度。在国际安全层面，古典学为和平稳定提供价值指引。古代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蕴含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智慧，与现代国际仲裁等争端解决方式相契合。西方古代城邦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为现代国际组织构建集体安全架构提供范例。在国际经济治理方面，古代丝绸之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精神和欧洲海上贸易诚信交易、风险共担原则，为现代全球贸易规则完善提供蓝本，助力各国制定经济政策。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古典学蕴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能搭建起全球沟通理解的桥梁，凝聚各国力量，其引导各国以更具人文关怀和历史视野的方式，跨越文化差异应对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促使全球治理朝着更科学文明的方向发展，充分展现其深远价值。

如何用好古典学助力文明互鉴

拓展跨文化诠释。跨文化诠释能够通过



首届“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近日在巴西圣保罗召开。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下如何突破舆论困境、增强国际发声能力，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和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不仅关系到“全球南方”国家能否打破信息桎梏、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关乎能否重塑公平合理的国际舆论秩序。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新闻手段丰富多元、传播渠道空前拓展且能全面覆盖受众的特点。这一时代，在为信息资源拥有者带来巨大传播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竞争中，话语权的争夺成为焦点。话语权，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体现，反映了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优势，其思想、主张连同利益诉求就可以通过广泛传播大行于天下；相反，若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不具有话语优势，甚至时常被“主流话语”置于各种道德审判席上，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影响力也会受到极大限制。

近年来，国际舆论形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下呈现动态演变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逆全球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尤其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及同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的逆全球化思潮。在此背景下，“地球村”概念遭受重创，贸易保护主义、边境封锁和移民限制等措施成为常态，这不仅挑战了多边主义原则，还破坏了一系列国际规则，使得全球政治经济局势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的这些反全球化政策和冷战思维，促使全球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转变，导致国际社会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国家通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积极寻求突破发达国家设置的信息和舆论障碍，力求改变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格局。例如，中国自2009年起就启动了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旨在改变国际舆论场上的“西强我弱”格局。此外，中国在2020年9月8日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2021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彰显了中国对于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责任与担当，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一段时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的努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使其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出更多声音、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在全球决策中拥有更多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5G、AI等新兴领域，这些国家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和规则，进一步增强了自身话语权。此外，区域内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促进了信息合作，强化了“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力量。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在提升话语权的进程中仍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从外部环境



程曼丽

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反全球化政策以及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形成强大压力，使其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从内部因素来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阻碍在提升话语权行动上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此外，在信息时代的关键领域，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在资金投入和技术水平上依然有差距，束缚了其在信息传播等相关领域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

在国际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全媒体时代，“全球南方”国家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话语权？一方面，应强化全媒体内容建设。深入挖掘“全球南方”国家丰富的文化、发展经验等素材，创作优质内容，既要有对本土发展的深刻剖析，也要有对国际事务的“全球南方”国家视角解读。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国际话语协同体系。“全球南方”国家应秉持平等、互利、共赢的理念，形成相互协作的话语沟通模式。在这个体系内，共同商讨制定话语规范和传播策略，防止出现内部话语分歧和信息杂乱的情况。同时，积极同国际上其他利益诉求相符的国家或组织开展话语合作，通过联合举办国际论坛、共同开展研究项目等途径，增强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此应对西方话语霸权，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为此，“全球南方”国家需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协同共进，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作为，共同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这是走向国际话语公平的必由之路，需要各国携手努力。（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发展注入能量。在经济领域，古希腊海洋贸易智慧启迪现代国际海运和贸易往来，阿拉伯古代商业体系经验对跨国商业合作与资源调配有借鉴价值，中国古代“交子”的创新精神为现代金融创新和经济流通带来启示；在科技领域，古希腊阿基米德的科学探索精神与方法为现代科研提供了思路启发，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科技发展进程影响深远，古典学为科技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促进科技成果在不同文明间的传播与应用。古典学通过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作用，有效消除文明隔阂，为文明互鉴搭建桥梁。

挖掘共通价值。这一过程是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深刻剖析，也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发展模式的积极探寻。如法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正义观以及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高度一致，彰显了人类文明在价值追求上的内在共性。这种尊重他人、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内涵，是人类对生命尊严、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关系永恒追求的成果。在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实践中，共通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这些价值观念是构建公平、有序国际市场秩序的基础，可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恶性倾销等不正当竞争，保障国际经济合作的可持续与稳定；在地区冲突中，它们是维护和平、保护平民的道德指引，促使各方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利益，从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出发，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之道。古典学通过挖掘和弘扬这些共通价值，能够驱散不同文明间因误解和偏见产生的阴霾，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